

我手边有巴老的三封信。

第一封是写在“文艺月报”十六开的信纸上，用的是收获杂志社的信封。“文艺月报”是上海文联1953年1月创办的，1958年改为《上海文学》。1980年，巴老给我写信时用的这种信纸，肯定也是1958年之前的，在巴老家里至少存放了20多年，已经发黄发脆。

喜儒同志：

信收到。访日文章，发表了两篇，寄给您看看。可能还有一篇《长崎的梦》。小林没写什么。您的文章没有拜读。我这里没有《湖北文艺》，可否请您寄一份来看看。祝好。

巴金 二十六日

巴老没写年月，但从邮戳上看，可能是1980年10月。那时，中国作协刚刚恢复工作不久，但已经开始与日本文学界交流，1979年，组派以周扬为团长，苏灵扬、欧阳山、姚雪垠、冯牧、梁斌、杨沫、柯岩、林绍纲、周斌（翻译）为成员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1980年，组派以巴金为团长，冰心、林林为副团长，艾芜、草明、公木、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吴青、李小林、陈喜儒（翻译）为成员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这两个有多位国宝级大家的代表团，震动日本朝野，产生了广泛影响，为开创对日文化交流的新局面，保持高层次、长期稳定的交流态势奠定了基础。

访日归来后，作家们在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当时我的领导指示：一、将团员发表的文章收集起来归入各团档案；二、复印寄给日方接待单位，供其译介发表，不可人一走茶就凉，务必做好后续工作；三、

■记 忆

巴金的三封信

□陈喜儒

条件成熟时，可考虑编一本中国作家访日的散文集。于是我写信，请访日的作家将已发表的文章寄来。巴老寄来了《友谊》《访问广岛》两篇、《长崎的梦》刚刚写完，还没发表，所以巴老说可能还有一篇。巴老信中所说“你的文章没有拜读”，我不知是指我写的，我译的，还是我整理的文章？另外，《湖北文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980年，我在湖北的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是翻译水上勉怀念老舍的文章《蟋蟀罐和柿子》，刊登在《长江文艺》第五期；一篇是整理冰心在日本讲演的记录稿《我与小读者》，刊登在《艺丛》第二期；一篇是我写的《作家的生命——记巴金在日本》，刊登在《艺丛》第三期，均与《湖北文艺》无关。现在回忆，可能在我给巴老的信中提到了发表在《长江文艺》上水上勉怀念老舍的文章，所以巴老想看看。查阅有关资料，《长江文艺》1949年6月创刊，1966年停刊，1973年5月复刊，改名《湖北文艺》，1979年恢复《长江文艺》刊名至今。1980年，《湖北文艺》已经寿终正寝，由此看来，可能是巴老记错了。

第二封信，用的是“上海文学编辑部”的中号信封，收获杂志社的300字稿纸，贴2角1分邮票，注明挂刷。稿纸绿色竖格，很薄，质地极差，看样子有年头了。

喜儒同志：

译文拜读，可以发表。至于在哪里发表，还是请您考虑，我无意见。勿复。祝好！
巴金 十二月十五日

这封信也没写年份，但从邮戳上看，是1980年。那年4月，巴老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与日本著名剧作家木下顺二先生的对谈，发表在日本《图书》杂志上。我译出后，将译稿呈巴老校阅，并问巴老希望在什么杂志上发表。巴老校阅后将译稿寄回，并写了这封信。《巴金与木下顺二的谈话》发表于1981年5月《小说界》文学丛刊第1期，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全集》第19卷，题目改为《和木下顺二的谈话》。

第三封信，是用航空信封寄来的，写在大半张绿色稿纸的背面。

喜儒同志：

你的信都读过，只是我写字困难，未写回信，请谅解。《日本文学》八四年第四期我并未收到，因此与木下对谈的译文尚未看见，是否可以找两份寄给我？谢谢。祝好！问候大家。

巴金 十七日

这封信也没写年月，但看邮戳是1985年1月。在这封信中，巴老不再称我“您”，而用“你”，我很高兴，说明在巴老眼中，我变成了真正的“小陈”。

1984年5月9日至23日，巴老以中国笔会代表团团长、中国笔会会长的身份，应邀赴日出席国际笔会第47届大会。在日期间，巴老与日本笔会会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日本著名剧作家木下顺二等朋友多次对谈。我根据发表在日本文学杂志《昴》及《京都新闻》《朝日新闻》的谈话记录及现场笔记，译出《探索友谊——巴金与井上靖的谈话》《有朋自远方来——巴金与井上靖的谈话》《作家的责任和良心——巴金与木下顺二的谈话》三篇，请巴老校阅。巴老看后将原稿寄回。《探索友谊》发表于1984年11月15日《当代文艺思潮》第6期，《有朋自远方来》《作家的责任和良心》发表于1984年长春的《日本文学》第4期，后均收入《巴金全集》第19卷。

收到巴老信后，我打电话给《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李长声君，嘱其尽快把刊物寄巴老。

从这三封信看，巴老写信很不“讲究”，手边有什么信纸信封，不管多陈多旧，抓起来就用。巴老可能节俭惯了，身边的“陈谷子烂芝麻”不少，只要能用，都舍不得丢。给我的这三封信，用了三种不同的信封和信纸。前两封信，虽然信纸发黄发脆，但毕竟是整张，而第三封信，是绿格原稿纸的大半张。仔细看，这是一张400字竖写稿纸，绿格，但比前两封信的纸要好，不知是写错了，还是别有用途，反正裁去了一块，还剩下大半张。巴老可能看这稿纸质地优良，扔了可惜，所以用它给我写了封信，派上了用场。

■土地与生长

到江南看冬小麦是此行初衷。一直到南宋时期，冬小麦才在长江下游地区成规模种植，这一方面是由于南宋时期北方人员大量南下，越过淮河，越过江淮缓冲地带，越过长江，进入江南、华南，定居于从沿海到内陆山地平原的广大地区。人员的迁徙，自然会附带饮食文化的流动。流动也许是相对简单和容易的，但要改变传统饮食结构并接纳全新的事物，则并非易事。对北方外来的人群如此，对南方的当地人也是如此。北方外来人群要解决的是适应稻米及南方蔬果，南方人要解决的则是适应权力携带而来的面食。食物之于人的表层上的作用，不外乎满足人的口感和饱腹感。饿了要吃东西，这是生理的要求，但如果不是饥不择食，人类就总是要讲究饮食文化的。

如果从江南的角度看，小麦是典型的“外来物种”。江南的粮油作物，水稻是完全本土的，浙江等地发现过距今7900年以前的水稻碳化物，中学的课本上也说，合肥（这是江北，但离江南很近）等地都是水稻的原产地之一，除水稻和油菜之外，小麦、玉米、山芋、土豆等粮食作物，都有它们外来迁移的较明确的路线图。冬小麦在江南落户的次级动因，也许是冬季对裸地的保护和覆盖作用。由于自然环境的原故，我怀疑这已经不是一个动因了。以江淮分水岭为界，愈往南，这个动因愈被缩小；愈往北，这个动因愈被放大。相对干旱的黄淮海平原，冬天朔风呼啸、土地龟裂，没有绒毯一样的冬小麦保护，疏松的耕作土会被寒风吹掠尽净，沙尘暴也一定会更加频繁。这和蒙古高原的情况是一致的，当草原被开垦成农田，或由于牲畜的过分啃噬，草原失去了草本植物的固守和保护，很容易沙化扬起，被大风裹挟而下。所以，冬小麦像草原上的牧草一样，既是一种食物，也是一份保护，充溢着大自然的道理和智慧。这是人类的宏观选择，在这种选择面前，口感和营养都是次要的。所谓口感、营养或饱腹感，还不都是人类的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其实也是人类适应自然界的长期积累。

而江淮分水岭之南则大不相同，愈往南，空气的湿度愈大，地表的储水器，譬如江河湖塘愈多，干旱呼啸的北风为湿润的山峦冈丘所消弱，其势难强；再加上植被茂盛，裸地鲜见，耕地又有角块块高高低低不成规模的特点，对冬季地表覆盖物的要求并不迫切。这一点，在3月下旬的江南行程中，我们在车上看得一清二楚。在铜陵、芜湖、当涂、马鞍山的沿江平原上，除却一片片葱厚的冬小麦和处于开花临界点的油菜外，许多田块都处于闲置状态，它们当然都是为即将到来的早稻的栽植做准备的。在那些闲置的田块里，除却去年晚稻收割后留下的枯灰的稻根外，土表都是湿润的，水耕熟化之后的稻田本身又较凝固，在江南的地理环境中，这样的土地，不可能成为风神的俘虏。而由青阳到南陵再到泾县的山地中，冬小麦的种植大幅减少，但偶尔也能看到较小块的冬小麦的身影。皖南山地除了春夏秋的水稻和春季开花非常茂盛的油菜外，其他的农作物，东一块，西一块，零散分布，大致上是平分秋色的。

这是一个暖融融的春日。从安徽当涂青山的李白墓、泾县低山中的桃花潭、东至大渡口镇人头攒动的老街和菜市场，到江西彭泽马垱核电站工地和棉船岛长江渡口、湖口高速公路出入口、星子桃花源白鹿洞书院，江南长江下游大约三四百公里的地域，黄灿灿晃人眼的油菜花竞相开放。蜜蜂的数量虽然据说由于农药、空气等环境因素已经减少，但它们的辛勤劳作，继续给江南的春色增光添彩。到处都洋溢着一种舒适、放松、和谐、慵懒、衣食富足的浓厚气氛，怪不得那些追求山水田园之乐的古代诗人，都愿意在江南终老。“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那该是怎样一种富庶、祥和的景象。“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又是一种怎样的田园生活啊！人的意志需要多么坚强，才能不被这种仿佛衣食无忧的感觉腐蚀，才能振作精神，追求需要苦苦摸索才可得之的理想。江南鱼米之乡的氛围似乎难以诗人的奋斗精神推波助澜。

显然，诗人创作理想的推动，还有其他更强大和重要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诗人的奋斗不息？

追求四方之志、政治功名，是有使命感、命运感、高心智的知识分子的天然冲动，但这与潜心创作、默默耕耘，也一点儿不矛盾。相反，没有社会政治激情和家国理想的诗人、作家，则很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田园至亲的深刻体验与心领神会。由此看来，我们此刻看到和感受到的，到处都散发着的舒服、舒适、放松、和谐、慵懒、衣食富足的江南气息，并非诗人创作动力的根本来源。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级的社会生命驱动。

离开安徽东行进入江西彭泽后，沿江的平畴迅速减少，地貌骤然突兀而起的低山山头。冬小麦已基本销声匿迹，不过也许这仅是沿公路快速驶过所得出的不很准确的印象，或者这是愈远离南宋首都临安，受当时北人影响愈少，冬小麦种植面积愈减的规律吗？

陶渊明的东晋年代，江西各地不知是否已有小麦种植。很可能没有，或者至少没有冬小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有风自南，宴彼新苗”，这些“苗”是什么苗？看上去确实应该是豆苗，因为大豆的种植可以是春季，也可以是冬麦、油菜收获后的夏季，季节上大致就对了。那为什么不能是油菜苗、玉米苗、土豆苗、山芋苗或冬麦苗？因为油菜开春后已经拔杆打苞，不再是“苗”，玉米、土豆和山芋在那个时代尚未引进。而如果是宿麦即冬小麦，那么江西也是亚热带季风区，到阳历的4月，恐怕才会有南风吹来，更晚一些，4月下旬到5月上旬，一夜南风，冬小麦就灌浆黄熟了；有南风吹来的季节，冬小麦已经变成了硬秆植物，不能像幼苗时那样随风摆动了。当然，这些“苗”也可能是春小麦苗、春小麦的种植和水稻、大豆等作物在时间上是重叠的，但春小麦的产量较低，用它跟水稻争农地和季节，需要认真地因地制宜、权衡选择。

千余年过去了，冬小麦在安徽、江苏、江西等省江南地区的推广、种植，不知道确切是什么状况，因为从公路上快速通过，在油菜花占绝对优势的4月初，很难再看到其他小宗作物的身影。我在东至县胜利镇省道边一幢高大崭新的宾馆3楼的窗口放眼远眺，只见油菜花海烂漫，将远村淹没。我离开宾馆，步行进入公路对面的花海，这样，许多隐藏在宏观花海之中的生动细节，就开始一一浮出“海”面了。油菜花香而略腻，又高又壮，和在公路上看到的那种感受完全不同，它们普遍高过我的身高，大约平均在2米以上。

大片油菜围裹的空隙，突然出现短短几垄油黑茂盛的冬小麦。我兴奋地跑过去，蹲下身仔细瞅着它们。这是我这一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冬小麦。我再往前走，又惊讶地在灌满春水的田埂上看到十几丛长势旺盛的冬小麦——只有十几丛！再往前，我又看到一小块水田中，农人起了高垄来种几行冬小麦：垄上是小麦，垄沟里是水。我站在阳历4月初油菜花占绝对优势的江南沿江平原农作物的包围里，欣赏着灿烂无际、香而略腻的油菜花和微不足道的几垄冬小麦。毫无疑问，这些冬小麦由于数量太少而根本没有商业价值。但农民为什么还要种它们？仅仅是作为口味调剂的点缀？还是千百年来北方文化入侵的物质遗存？我说不清楚。但现实摆在这里，这是一个新线索，也是一个新问题探索的开始。

寻访妻子的足迹
□许辉

同行的弟兄

□雷抒雁

我们会像他一样
在大街上去扶老帮幼
然后说：我叫雷锋

我们学这位士兵
到有困难的人身边去
说把困难给我
然后说：我叫雷锋

雷锋，就是我们
是我们的集体姓名

我们用热情而稚拙的诗
表达我们的赞颂、热爱和崇敬

我们和老诗人一同到民间去朗诵
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激起一阵阵不息的掌声

老诗人柯仲平的诗句让人难忘
“雷锋啊，是向阳花
我是一颗老南瓜
向阳花越开越旺

我们爱这位士兵

老南瓜越老越红”

那老头激动得满脸通红
一双手使劲地搓搓个不停

其实，那时我们还很肤浅
只把雷锋看成爱做好事的青年

还不懂得人生的深意
也不懂一个人与千千万万人的关系

之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搅乱社会的“文革”
雷锋，像是远离我们而去

孩子呼喊：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我们也问：你在哪里，我们的好兄弟

六

雷锋还在
依然那样年轻

斜挎着军包

行走在军营

雷锋还在
依然那样年轻

行走在中华大地
在每个善良人的心中

春天、阳光和他的名字一同拥抱大地
传递着温暖和光明

一个心无纤尘的人
一个热爱他人的人

雷锋，一个好人
生命短暂，却获得了永生

七

自青年时认识雷锋
我们就这样并肩同行

而今，我虽已白发苍苍
他却是我记忆里的青春

我这样说给我的儿孙
雷锋，不是叔叔，不是爷爷

他会与你们同行
也是你们永不衰老的弟兄

行走在延河之岸

□班清河

我怀着虔诚与渴望的姿态
轻轻踏上这块土地
行走在缓缓流淌的延河之岸
埋葬那一片黑暗之滨
东方一片透明的天空
陕北汉子高亢的呼喊
黄色奔腾拥出巨大的升起
邀请翠柏中的英雄结伴
交谊舞或是秧歌
战斗的温情枕在刚健的胸臂
我们谈论曾经有过的红色的开始
血液中每个分子都在不屈地跳动
记录沉甸甸的重要日期
血染湘江残酷的割舍
遵义灯火望穿千军万马的迟疑
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
漫天黄沙落下的小米
半个床头的书籍抽出历史精髓
剥去经典的华丽
活的灵魂赤裸裹上黄土的气息
当思想使我们成熟起来
这面旗帜下一个民族前赴后继

我怀着虔诚与渴望的姿态
轻轻踏上这块土地
行走在缓缓流淌的延河之岸
丛林和窑洞穿梭着不安的人流
梦境困扰都市的拥堵与喧嚣
占满欲望的心灵挤出一块绿洲
在这里寻找过去的记忆
高高山坡苍翠柏飘扬的红旗
举起右臂心灵再次战栗
宝塔见证潮落潮起的岁月
黄河汹涌载着时代沉浮
嘹亮的船工号子
点燃我心中久远的火炬
长满绿色的芳草树木
生机蓬勃散发诱人的气息
信仰让我们重新伫立起来
延河之岸 这里让世界惊奇

■生活质感

碎瓷

□苏叶

讲利害，人还有什么味道？

老先生甲这才正色道：所以天下只有一个贾宝玉，了不起，他没有势力！了不起啊！

那么，在摆脱了封建制度百年之久的现代化的今天，怎么人的意识还不如一个公子王孙宽柔纯净？

莫非，社会的进步是以戕害性灵丰富的生机为代价的？

莫非，自以为是的现代人，吃同样的炸鸡，用不同的手机，只是为了步调一致地迈向快乐的同质化？

这和秦朝泥坑里整齐划一的兵马俑有什么区别。

不同的只是手上的兵器改持为一网打尽的电子产品罢了。

细的、易碎的是更该珍惜的，是转瞬即逝不可重蹈的。如落花之有叹，如细雨之无声，往往，幽曲微小以其脆弱的特性更接近生命从无到有，由生而灭的本质。人生之可贵，贵在有情感，有情，比如美和爱。比如书法艺术，不是看写的字是否正确，而是看其间的笔情墨趣和气度怀抱。细腻和空灵，或说神韵气韵，是无法用化学物理解剖学来衡量的。精神世界的微妙才是我们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根本成就。钢铁也会锈，琉璃也能久，万物都有存在的理由。生存的千辛万苦把人们锤炼得坚韧不屈，但如果由此带来心灵的僵化和枯竭那就可悲了。

如果非要咬文嚼字，我说的“恐怖”，仅是感受程度的情绪性表达而已，我们不能被单一的概念框住了是非对错。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不应该是倒过头来禁锢我们的锁链。

如果我们缺少了内向体验的唯心之美，只认教条和概念，那真是太恐怖了。